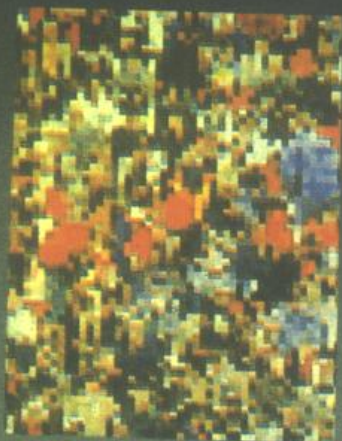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SERIES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現代人口學

魏津生 著 重慶出版社



MSSS

MODERN SOCIAL
SCIENCES SERIES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現代人口學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MODS

MODERN SC SCIENCES SERIES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現代人口學

魏津生 著 重慶出版社

MSSS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赵文林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魏 津 生 著

现代人口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插页5 字数 353 千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000

*

ISBN 7-5366-1765-8/C·44

定价: 6.15元

重庆出版社“现代社会科学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 蒋际华

副 主 编 周宗贤 颜尚贤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周宗贤 赵文林 黄长军 蒋际华 颜尚贤

常务编委 赵文林

60693/8

出版者的话

前些年国内一些兄弟出版社出了许许多多介绍国外新知识的中小型读物。这些小册子围绕一个小的领域或一件两件事情，使用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进行研究和阐述，就像放电一样，迸出一朵又一朵的耀眼火花。这些小册子对文革后国内知识界的观念更新起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但时至今日，广大读者已不能满足这些零星的介绍了。人们意识到，要成为一个现代文化人，非系统掌握社会科学各学科新的理论体系不可。而社会科学新知识的系统介绍又朝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系统介绍各门新的学科；一是系统介绍老学科的新内容。在前一个方面，现在已引起广泛的兴趣，一本又一本的《××学》正在陆续出版。可是对后一个方面却未引起应有的注意。事实上这些老学科今日仍是社会科学中的骨干学科。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骨架仍然基本上被蕴含在这些老学科之中。为了使广大读者系统了解这些骨干学科的新内容，重庆出版社组织高层次研究机构的专家编写了这一套中级学术读物。这一套书的每一本在开始部分力求通俗，引人入胜，然后逐步升堂入室，达到较高深的境界。原来学科功底较差的读者能够逐步加深理解，而知识原较广博的读者又都有所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了保证编辑质量，我们聘请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日报、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国社科出版社等单位的一些专业编辑或编辑室主任担任特约编辑。在此一并致谢。

重庆出版社
1988年7月

目 录

第一编 绪论	(1)
第一章 现代人口学产生的历史	(1)
第一节 古代和中世纪的人口思想: 政治思想家的观点.....	(1)
第二节 近代人口理论: 分学科的研究.....	(10)
第三节 现代人口学: 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形成.....	(24)
第二章 现代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9)
第一节 现代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29)
第二节 现代人口学的一般研究方法.....	(34)
第二编 动态人口分析	(53)
第三章 生育、生育趋势和生育决定因素	(53)
第一节 生育的基本概念和测度指标.....	(54)
第二节 当代的生育趋势和生育的年龄格局.....	(67)
第三节 生育决定因素分析.....	(81)
第四章 死亡、死亡趋势和死亡决定因素	(116)
第一节 死亡的基本概念和测度指标.....	(117)
第二节 当代的死亡趋势和死亡的性别及年龄格局.....	(129)
第三节 死亡决定因素分析.....	(147)
第五章 迁移、迁移格局和迁移决定因素	(168)
第一节 迁移的特性、定义和类型.....	(168)

第二节	迁移的测度方法和指标	(179)
第三节	国际迁移	(188)
第四节	国内迁移	(197)
第五节	迁移决定因素分析	(207)
第三编	静态人口分析	(229)
第六章	人口规模及其变动	(229)
第一节	人口规模和人口变动的概念、测度和描述	(230)
第二节	人口变动机制和世界人口变动状况	(241)
第三节	人口预测和未来人口变动展望	(257)
第七章	人口的性别和年龄结构	(270)
第一节	人口的性别结构	(271)
第二节	人口的年龄结构	(280)
第八章	人口分布和都市化	(304)
第一节	人口分布	(304)
第二节	都市化	(318)
第四编	人口的影响与影响人口	(339)
第九章	人口与社会、经济	(339)
第一节	人口与经济增长	(340)
第二节	人口与粮食	(350)
第三节	人口与教育	(356)
第十章	人口与资源、环境	(364)
第一节	人口与自然资源	(365)
第二节	人口与环境污染	(373)
第十一章	人口控制的政策、状况和运行机制	(383)
第一节	人口控制政策及其产生	(384)
第二节	各国政府对人口增长的态度和政策概述	(391)
第三节	人口控制的运行机制	(401)
第十二章	人口控制的成本—效益分析	(407)
第一节	人口控制的成本—效益分析的意义和特点	(407)

第二节	人口控制的成本分析	(413)
第三节	人口控制的效益分析	(426)
第四节	计划生育作用评估	(437)
后记		(449)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现代人口学产生的历史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历史的延续性，同时又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人口思想中虽然有着现代人口学的某些渊源，但从这门学科今天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它的酝酿和初期的发展主要还是存在于近代人口理论之中，而其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的形成则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应该说，现代人口学不仅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而且还是一门至今仍处于不断充实和发展中的学科。

第一节 古代和中世纪的人口思想： 政治思想家的观点

一、古代和中世纪人口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点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口增长的历史如果从最早的人类——猿人算起，迄今已有300万年。这漫漫的历史长河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古代和中世纪流过的，只是从公元17世纪以后，它才转入近现代的发展时期。

在古代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生产工具十分简陋。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采集野果和狩猎捕鱼，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经常处于饥荒、疾病和格斗之中。这些状况决定了原始社会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都不能不同时在波动中

处于总体的高水平上。据估计，两者大约都摆动在50%左右。当然，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起来，毕竟要在更多的一些时候显示出哪怕是极其微弱的优势，否则人类就难以维持并繁衍下去。但从长期趋势看，原始社会时期世界人口的增长基本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按照通常使用的估计数据，人类自产生至公元前8000年即原始社会末期，经过约300万年，人口才缓缓增至750万人左右。如果假定人类产生时只有男女二人，那么这一时期世界人口年平均增加数仅为2.5人，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005%。这与后来世界人口增长的格局相比，的确是一种微不足道和近于停滞的增长趋势。但是，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在原始社会那种难以想象的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人类毕竟没有像大多数动物那样趋于灭绝，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繁衍下去，为其后地球上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点。

自公元前8000年以后，人类从古代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再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直到公元17世纪中叶这一社会形态开始解体，前后历经近万年。这一时期农业革命的发生及向世界各地的扩展，使人类从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转变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力水平比原始社会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第一次获得了生活资料首先是食物的相对可靠的来源。这不仅会降低在原始社会时极高的饥荒死亡率，而且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数量的迫切需求更使出生率长期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另外，这一时期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国家机器履行的军事职能(这里主要指征兵)和经济职能(主要指征收赋税和徭役)也是要求高出生率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因素。所有这些乃是古代和中世纪的“增殖人口”或“赞美生育”观产生、流传并一直具有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虽然从总体看都处于40~50%的相当高的水平上，但是在更多的年代前者还是稍低于后者，因而世界人口才从上一时期末即公元前8000年时的750万人增至本时期末即

公元17世纪中叶时的5.1亿人，平均每年增加5.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0.044%。这个速度当然还十分缓慢，但较前一时期的增长率毕竟提高了80多倍。正是在这个时期地球上的人口才结束了它在长达近300万年中的几乎是停滞增长的状态，展现出极其缓慢的增长的格局。

但是，这种缓慢的人口增长在这一时期近万年的时间里决不是平稳进行的。总体上处于40~50‰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水平是在这两者的不断波动变化中实现的。特别是在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波动幅度更大，其中尤以死亡率的波动为著。每当统治阶级加紧剥削和压榨广大奴隶和农民，社会上的灾祸和战争相互交织，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显著激化时，人口死亡率就会迅速上升，出生率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结果人口增长速度跌落，人口数量缩减。这时，社会上“增殖人口”的呼声更为高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每当社会经历了急剧动荡，生产力横遭破坏后，统治阶级不得不与民休养生息，减轻赋税和徭役，推行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时，人口死亡率又会回落，出生率则会回升，人口数量不断扩大。当这种趋势持续发展到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再次激化时，“适度人口”观又往往为社会舆论所热衷。这些均由一定时期的历史条件所决定。

古代和中世纪人口思想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无论是“增殖人口”观还是“适度人口”观，都是各时代政治思想家的哲学和政治观点的组成部份。他们主要是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的多少与这个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关系出发并以此为核心来考察人口。虽然这也要涉及到一些其他的人口现象，如人口的分布、构成、婚姻、生育、死亡和迁移，但是各种人口现象在古代和中世纪政治思想家的头脑中都还是一些只是被粗浅地感觉到的浑沌的存在，而远非科学的认识。当时他们不仅不可能了解整个世界及其各地区的人口变动，就是对自己所在的国家的人口状况的认识也

是极其不完整、不准确和不连续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代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既不能确切地把握各种人口现象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也不能全面地分析人口现象与社会经济等非人口现象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只能是根据局部的、个别的观察甚至猜测来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并把这种认识附着在政治思想的框架内。古代和中世纪人口思想的这一基本特点的形成，除了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整个学术研究的状况外，更直接的原因还由于在古代和中世纪没有象近代以后那样的内容日益精细、复盖范围不断扩大的人口调查。当然，古代是有过人口调查的。如公元前4500至3800年巴比伦的调查、公元前21世纪后中国夏商的人口统计、公元前435至410年古代罗马的调查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调查都只是为征兵、征税和征服劳役的目的服务，一般仅满足于对人口数目的调查统计，同时伴有经济方面的调查项目。这些调查都是局部的、不定期的，其结果不仅不准确，而且常常不予公布。中世纪时东方国家的一些人口调查依然如此，而西方则因王权衰微，人口调查史实更少，只是有一些随宗教兴起而带来的教区对教徒生死婚丧事件的记录，其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显然，在古代和中世纪这样一些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决不可能展开近现代意义上的那种人口研究。

二、“增殖人口”观

“增殖人口”观或称“赞美生育”观是古代和中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一种人口思想。在古代奴隶社会，它集中反映在古希腊时斯巴达的社会政策和古罗马时代的法律中。

自公元前8至前2世纪的古希腊时代，有众多的城邦制国家，其中最典型的奴隶制城邦就是斯巴达。斯巴达人通过征服战争，把土著居民变成国有奴隶或半自由民，以剥削他们为生，对邻国则实行侵略，以武力扩大生存空间。斯巴达所实行的完全是军事

贵族寡头统治，崇尚武力，成年男子皆为战士。斯巴达的许多社会政策就是从这种军事目的出发，推行各种增殖人口的措施。按规定，斯巴达人务农、不做工、不经商。其男性儿童从7岁起送进儿童营军训，从18岁开始一律参军，直到60岁才可退伍。为了不断补充兵源、弥补战争中的人口消耗，斯巴达把年轻人口的增殖视为国家的头等重要任务。为此，他们在婚姻和生育上实行国家干预，在政策上作出有利于人口增长的规定。结婚是斯巴达人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必要手段，所有公民都必须承担结婚义务，独身和不育遭到歧视和制裁。斯巴达妇女经常把独身者拉到祭典仪式上用皮鞭抽打。结婚的年龄也不能过迟。在生育上，国家以法律要求公民必须生育两个以上儿子，对生育三子以上的父亲则可免除部分或全部义务。不过，在斯巴达的社会政策中，同时也十分重视确保人口的健康素质。斯巴达婴儿降生后，必须经过长老的检查，健康者留下，病弱畸形者弃之山谷。对结婚年龄除规定不许过迟外，也不可过早。夫妇必须在适当年龄结婚，以保证生育健壮的婴儿。由此可见，在斯巴达的社会政策中大力增殖人口特别是增殖健壮的人口占有突出的地位，同时也明显地反映出生育上的男性偏好。这些对于后来的古罗马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古罗马奴隶主政权从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5世纪，是在几百年的征战中兴起的，它不断地对内镇压奴隶起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如同斯巴达一样，大力增殖人口，不断补充兵源，就成为古罗马在立法和实施政策时首要考虑的问题。古罗马政权将人口增殖视为力量的源泉，它在很早就设立风纪官来管理婚姻和生育，同时不断通过立法，推行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政策。这突出地体现在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公元14年)主持制订的法案中。按照这些立法的要求，古罗马人不仅必须结婚和生育，而且男子到25岁，女子到20岁时就必须分别生育规定数目的子女。对于不婚不育者实行惩罚：不婚者取消继承权，已

婚未育者，遗产继承减半；永久不育者，只能继承财产的十分之一。相反，对于已婚多育者则给予各种特权，如在委任官职和分配征服的领土上的优先权以及多子女母亲可穿戴专门设计的服饰等，以期提高结婚率和出生率。

“增殖人口”观在中世纪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社会、政治和哲学的观点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成为封建社会里有着长期影响的重要人口思想。这特别在世界上率先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国，更以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为主要依托，得到了相当完整而持续地体现。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人口思想象他的其他方面的思想一样，经过其弟子和后代学人的继承和发挥，对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封建诸侯割据，列国战争不绝。人口死亡率迅速上升，出生率下降。各国统治者对此纷纷要求增殖人口，以广兵源、税源和役源，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增殖人口”观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主张大力增殖人口。儒家学派一方面从“孝”的观念出发，要求不绝祖祀、子孙繁庶；另一方面从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出发，认为统治者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使人口众多。人口不流失而能安居乐业，这是一个国家是否得到治理的重要标准。

第二，增殖人口必须采取一定的社会经济措施。儒家学派主张为了增殖人口，首先要重视男婚女配，并规定男子20岁就应娶妻，女子15岁即可嫁人。同时国家还要推行“仁政”，爱护百姓，鼓励农耕，减轻赋税和徭役，照顾鳏寡和贫者。这样才可增加本国人口，广招四方之民。

此外，在儒家学派的人口思想中还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使轻视妇女的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这对人口增殖上

的多子多福的男性偏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中国相比，西欧从公元5世纪才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它所历经的时间也较短。欧洲在公元初年形成并逐渐传播的基督教人口思想，虽然由于它允许早婚、禁止离婚和反对节育而在客观上有利于人口增殖，但是这种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人口思想极力宣扬禁欲主义，赞美独身，从而对西欧5至12世纪人口增长的缓慢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后，随着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连续不断的战争的需要，增殖人口的呼声也相应增高。从13世纪开始，一些教会思想家力图把基督教教义与现实增加人口的要求调和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有阿奎那和马丁·路德二人。

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 1225? ~1274年)是13世纪欧洲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他一方面维护宗教的禁欲和独身主义，另一方面又以人类繁衍为理由，肯定世俗大众结婚和生育符合于人类本性和自然权利，从而赞许人口的增殖。马丁·路德(Martin Lutter, 1483~1546年)是16世纪初宗教改革领袖。他同样认为结婚是完全正当的，而独身往往会触犯罪恶。对结婚迟疑不定的人是对上帝的恩惠缺乏信心的一种表现，因此他主张男子结婚不要迟于20岁，女子在15~18岁必须出嫁，从而适应了当时增殖人口的客观要求。

三、早期“适度人口”观

早期“适度人口”观是古代和中世纪另一重要的人口思想。也许由于它的代表人物在欧洲是最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因而对这一观点的阐述往往在古代人口思想史上占有过份突出的位置。

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年)都是古希腊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们先后提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理想国的方案，其中对当时

人口问题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乃是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生活的时代是希腊各城邦普遍历经危机的时期，战争此伏彼起，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日益加剧。为此他们主要不是从经济而是从加强防御和管理的角度来考虑“小国寡民”的城邦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的早期“适度人口”思想。这两位思想家按照理想国的概念，认为能够使城邦国家中的人口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的状态是最理想的状态，因而人口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应该适度。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从它的土地和它与邻国的关系才能确定其人口数量。按照他的计算，一国如有5040个公民对国家最有利。亚里斯多德认为土地和财富不可能象人口增长得那样快，一国人口的适宜数量就是足以满足生活所需的目的，同时彼此相见又能互相认识的那个数量。

与其说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关注人口思想，不如说他们更加关注制订相应的人口政策。他们为实现适度人口规模，都力主国家应该干预人们的婚姻和生育。对此，亚里斯多德更针对柏拉图的财产共有、共妻共子的主张，明确指出企图用均富政策来维持一定的人口数量不如用限制人口的办法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建议统治者要根据现有人口调整结婚人数，规定男女结婚年龄，使男女两性间的生理状态和性交能力在年龄上互相配合。同时还应规定已婚者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为国家生育后代。为了生育健壮的后代，国家应把最优秀的女子婚配给最优秀的男子，负责培养他们的子女，以保证后代有良好的素质。新生儿要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有缺陷的孩子要被秘密埋掉。亚里斯多德还建议国家应制订不准生育残废或畸形儿的法规。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上述思想只能被看作是适度人口理论在西方的最初萌芽，因为几乎与他们同时代，在东方的中国也产生了早期“适度人口”思想家商鞅和韩非，并且他们的种观点几乎一直流传于后世的中国封建社会。